

生命意识的觉醒

——杨王孙、叔本华之比较

□李 平

在人类历史上,出现过许多行为偏僻性情乖张,但又令人不能不重视的“怪人”。中国古代的杨王孙和西方现代的叔本华就是其中的出类拔萃者。他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内容独特得出奇,使人们在惊叹之余,恍然若有所悟。为什么这类人物在不同时代的世纪末或世纪之交的不同文化氛围中,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出现呢?这种现象到底说明了什么?也许,从杨王孙与叔本华的比较中,可以发现一些很有意味的东西,为我们如何顺利过渡到21世纪提供新的观察点和参照点。

比较的基础

杨王孙是公元前2—前1世纪之交的中国人。《汉书》载:“杨王孙者,孝武时人也”。①汉武帝在位54年(前141—前87年)。《汉书·府志》载,杨王孙乃汉中城固人,与西汉的张骞、东汉的李固同县。叔本华是公元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期(公元1788—1860年)的德国人。虽然杨王孙约死于公元前2世纪末,而叔本华则主要活动在公元19世纪的初、中期,但他们都是跨世纪的人物,沐浴并搅腾着世纪之交思想界的狂风,却是一致的。要比较这两个在时空、文化、文明跨度上差异很大的人物,必须先寻找到赖以比较的基础(即相似之处),建立起稍为扎实的出发点,才能开始。

杨王孙和叔本华的相似点在哪里呢?

首先,从行为方式看,他们两人都具有任情率性,不在乎物议的特点。这是他们

最受人訾议,亦是其精神人格最鲜明的表征。他们都是善于理财且家有千金的富翁,又都是善于享受人生的伊壁鸠鲁主义者式的人物。据《汉书》载,杨王孙“家业千金,厚自奉养生,亡所不致。”他在生活上尽情享受,要什么就追求什么,并想尽千方百计得到它。据叔本华同时代人的回忆和研究专家的证明,叔本华生于大商人和银行家的家庭。②17岁时,他父亲去世,留下一大笔遗产。他本人又善于生财,在繁忙的思考和写作之余,使自己的财产增加了好几倍。他嗜食美味,极贪口福,脍不厌细,食不厌精。他从不委屈自己,曾因女房客吵闹影响自己思考而将其推倒,引起官司、被处罚金亦在所不惜。他极端厌恶女人,却又有过一场疯狂的恋爱。

其次,从与时代的关系看,他们都具有反世俗流风的大无畏精神。杨王孙在儒学日益兴盛的时代,要求裸葬:“死则为布囊盛尸,入地七尺;既下,从足引脱其囊,以身亲土”;并公开宣布其目的是“矫世”。叔本华则将当时哲学中两颗明星——费希特、黑格尔——特别是后者,骂得狗头喷血,认为与他们生活在同一时代,简直如处于“两足的猴类”之间。他说:黑格尔哲学“作为使人变得愚笨的手段,是无与伦比的。这种哲学,是毫无意义的、不成句的一套乱语,是连篇废话,是文字的堆砌,在其庞大的著作中驱使着理性去思考不可能的思想,去思考令人发指的矛盾。它完全扼杀了理智”。③

最后,从思想倾向看,他们都推崇“尚柔”哲学。杨王孙喜欢“黄老之学”;而叔本

华则喜欢吠陀教、婆罗门教和佛教。叔本华曾说：“对优婆尼沙县的研究，是我生活的慰藉，并且至死都是我的慰藉”。④优婆尼沙县（即《奥义书》），是印度哲学吠陀教和婆罗门教中最古老、最重要的经典。

杨王孙和叔本华在哲学思想上笃信“尚柔”，可是在行为方式，在对待世俗流风上，却表现出咄咄逼人的偏激气势，在这两者之间是否有矛盾呢？不！在他们身上，这三个方面是互相统一的。行为方式上的怪异，反抗流俗的坚执，正好是其哲学思想的外在表现。这种怪异、坚执，不是偏激，而是在尚柔哲学支配下，洞悟宇宙、人生奥秘之后，平静地对待生活，从容地消遣，并勇敢地为他人树立榜样的达观态度的正常显现。

尚柔哲学

尚柔，即以“柔”为上。这不是指凡事退让的懦弱，而是指那种把人放在宇宙之中适当位置来进行思考的思维态度。和一切教条的理性主义者、夸张的人文主义者把人看作宇宙之主宰、万物之灵长的自恋态度相反，尚柔者认为，人与万物同一，或者说，人是万物的一种，处于循环变化之链中，是偶然性刹那间的体现。因此，人应该从对自身的狂热崇拜中清醒过来，正确地认识与万物的关系，老老实实在地对待这一切。只有如此，他才能获得新的观察点，进而洞悉、觉悟，成为达者。

要理解尚柔哲学，必须从分析他们的宇宙观入手。杨王孙说：“吾欲裸葬，以反吾真。”“吾真”即我的本来面目，我的原始质素。为什么裸葬能够“反吾真”，而厚葬不能呢？杨王孙在《报祁侯书》中有一段极精彩的文字，可以看作其宇宙观的集中体现：

且夫死者，终生之化，而物之归者也。归者得至，化者得变，是物各反其真也。反真冥冥，无形无声，乃合道情。夫饰外以华众，厚葬以鬲真，使归者不得至，化者不得

变，是使物各失其所也。且吾闻之，精神者天之有也，形骸者地之有也。精神离形，各归其真，故谓之鬼，鬼之为言归也。其尸块然独处，岂有知哉？裹以币帛，鬲以棺槨，支体络束，口含玉石，欲化不得，郁为枯蜡；千载之后，棺槨朽腐，乃得归土，就其真宅。

其中“真、归、化”三者之间的关系需要说明。

杨王孙认为，人之真包括两个部分：精神和形骸。精神属于天，而形骸属于地。天地（即宇宙的表现形态）名为二，实则一，分别都是气的不同形态，区别仅在于：一是轻清者，一是重浊者而已。它们分则为气，合则为道。人死之后，精神回到天，形骸回到地，还原为气。这就叫作归。归，即融入宇宙之中，表面看来是消亡、消逝，实则孕育着“生”的无限性。因为，形骸消解，就是由肉体向物质元素的生成，其蕴含着被化育、或创造为其它生物的必然性。这种变化形式，又叫作化。人的出生，是物的偶然性显现；既去世，就应该裸葬，不惊不乍、无声无息地归于物，化于物。这才符合道的情理。相反，如果厚葬，就会鬲（隔）真、阻归、碍化，破坏道的规律。由此看来，杨王孙的宇宙观可以这样表述：宇宙是由各种物质元素的复合体（气）构成的。人虽然是有生命之物，但也同其它事物一样，是气的偶然显现形式。生于此者必归于此；归于此后，又成为其它事物生成的基质。

叔本华的宇宙观与此相似。叔本华说：

这种现象一旦消灭，其它现象立刻取而代之，攫取它的物质。⑤

你们知否这些尘灰是何物？知道它们是由什么制造而成？你们在轻蔑它之前，对这些应该有所了解。如今，那些被当作尘灰或躺在那里的物质，如溶解于水中立刻变为发出金属光辉的结晶体，施以电气的压力，甚至可发生电光。不仅如此，物质可自行变成动物或植物，从那神秘的怀抱中，发生生命。⑥

但是,在叔本华看来,物质只是构成万物的基质,而不是内在动力和根源。其动力和根源,只存在于意志的个体化原理之中。叔本华认为,万物(包括人)皆现象。现象的发生,是意志攫取物质的表现。万物皆有生,故必有死。要想不死,最好别生。所以叔本华引用索福克勒斯的话说:“不生,是最善的事;至于生者,应尽速回到原来的场所,即为第二之善”。如此看来,在叔本华这里,一切事物、现象(包括人),固然都成为意志的傀儡,但同时也成为物质的独特组合形态。

由上可见,尽管杨王孙和叔本华的宇宙观有一定的差异^⑦,但他们却经由东方哲学(即黄老之学和印度哲学)而统一起来,均承认万物同一,人是万物之一,因而必然受物质规律支配。

消除教条的理性主义者、夸张的人文主义者给人添上的一切神圣灵光,而把他摆在与万物同等的地位,这正是尚柔哲学的核心和观察问题的出发点。

生命意识

作为尚柔哲学的推崇者,杨王孙和叔本华都认为:人是物质元素的独特组合形式,其生存极其短暂,因而,每一个个人都是柔弱的、暂时的现象,不是永恒的,更不可能是至高无上的。由于他与万物齐一,所以,他永远也无法逃脱物质变化规律的支配。人,应当而且只有承认、接受、正视这一点,自觉地把自身摆在宇宙中的适当位置,并由此出发,来考虑与己有关的一切问题,他才能消除苦恼,获得解脱,获得自由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“人与万物同一”的命题,实在是人对于自我本质的深刻省悟,是生命意识的觉醒。它开启了一个新视角,使人不仅能客观地看待天地、万物,而且能客观地看待人本身、生命本身。

杨王孙和叔本华的过人之处正在于此。他们在有生之年很早就顿悟了;顿悟之后,又敢于将自己对于生命意识的觉醒付诸实践。事实上,杨王孙和叔本华的行

为方式之所以怪异,与世俗流风之所以抗衡,似乎都可以由此得到解释。

既然人与万物同一,自身不过是从无限的物质中分出的一部分,其存在很短暂,那么,作为个体的人,在这有限的生活中,就应该顺应、并满足物欲,即“厚自奉养生,亡所不致”。不但在吃上,力求精细,而且穿的、用的、行的、玩的,只要有财力,而又不巧取豪夺,也不妨尽情享受。既然回归于物质是人的最后归宿,是宇宙变化之大道,那么,死后以身亲土,以求速朽,还原为宇宙质素,才合情理。同时,既然已经悟到宇宙和人生的奥秘,为什么不以自己的行为和言论去“矫世”,清除笼罩时代的那些虚伪的教条,让世人直面真实呢?

倘若如上的分析有一定的道理,那么,他们的行为方式、处世态度的内涵,也就可以得到相对令人信服的揭示。他们只是在领悟了生命真谛之后,遵从尚柔哲学行事时,自然而然地做出选择。换言之,他们只是做了该做的事,站在这个角度,再反观尚柔哲学,可以发现新意义。

教条的理性主义者、夸张的人文主义者(例如儒家学派和基督教主义者),表面上把人抬高到万物之上,但实际上,是把人隶属于在上者、为尊者和神,异化为某些教条的牺牲品。尚柔哲学把人与外物视为同一,似乎降低了人的地位,实则具有消解教条、解脱束缚、解放思想的作用。因为,在“人是物”这一等式中,包含着人人相等——人人都来自物质并将回归于物质——的意蕴。它对于儒学和神学教条,具有摧枯拉朽的毁灭性的力量,使人在清醒地直观到自我本质和宇宙本质的同时,生出一种自豪感。

在这个基础上,把“人与万物同一”看作是极具真理性的命题,把这一命题的发现与提出,看作人的生命意识的幡然省悟,这是真正的人本主义、彻底的理性主义,和高明的达观主义的互渗、结合。由此,人更直观、更勇敢地面对自我、面对生活、面对宇宙。

人类生命意识的觉醒,把人与万物视

俞吾金博士访谈录

□本刊特约记者：冯平

俞吾金，男，1948年6月出生。66届高中毕业，1977年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，1984年获哲学硕士学位并留在现代西方哲学教研室任教。1986年起在职攻读博士学位，1987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，1988年10月——1990年10月在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留学，师从德国著名学者伊林·费切尔教授，研读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，199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，1993年晋升为教授，同年被批准为博士生导师。俞吾金现为复旦大学哲学系主任、复旦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、复旦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和学位委员会委员、上海市哲学学会常务副会长。

十几年来，俞吾金博士研究的主要方向是现代西方哲学、西方马克思主义、德国古典哲学。在这些领域他的主要研究成果有《问题域外的问题：现代西方哲学方法论探要》、《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》、《意识形态论》（博士论文）、《生存的困惑：西方

哲学文化史探要》等10部个人专著，和在国外学术刊物上发表的200多篇论文。其中在哲学界颇有影响的见解有以下4个方面：1、对哲学基本理论的反思，如对哲学的元问题、哲学的世界概念、存在问题等；2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概念的反思，如

为具有同一本质，这不仅出现在杨王孙、叔本华的理论中，出现在先秦的道家思想和印度的宗教思想中，其实，古希腊德谟克利特和留基伯所创立的原子论，其精髓亦在此。这说明，实事求是地看待人本身，从而在精神上获得解脱和超越，不是某一文化圈、某一社会群落看法，而是一种跨文化的共识。考察一下这种共识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轨迹，可以发现，它产生于人类社会高度发达，人欲横流，进而导致了残酷的、大规模的竞争，并越来越趋于白热化之时。其后，每逢社会发生巨大动乱或转折，还会通过个别人物的狂放言行显现出来。这又说明，它对于抚慰人心、安定社会，使人类和平、冷静地度过危机，保存物种不灭，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。

③④同上书第49页，第16页。

⑤⑥（德）叔本华《爱与生的苦恼》，中国和平出版社1986年版第96页，第159页。

⑦杨王孙和叔本华在宇宙观上最主要的差异是：前者强调道一元论，后者强调意志一元论。但是，叔本华从来也没有忽视物质。他认为，世间能够逃脱因果律支配的，只有两样东西：物质和自然力（意志）。他说：“这两者是一切变化的前提”。在这两个前提之间，随着论述侧重点的不同，叔本华时而说“物质亦同于自然力”，时而又说“物质是意志的直接反映”，“它以时间的不灭性再现意志的永恒性”（可参考叔本华关于“死亡”的所有论述）。造成这种逻辑混乱的原因，在于其内在思维的摇摆性。叔本华笃信东方哲学，也看到了物质存在的永恒性，但又推崇康德的“物自体”说，以证实自己所提出的意志才是更根本的力，因而陷入了两难境地。

作者李平，广东湛江师范学院副教授（524048）

责任编辑：陶原珂

①班固《汉书·杨胡朱梅云传》。以下引文凡未标明出处者均见于此。

②参见（苏）贝霍夫斯基《叔本华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。